

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

——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徐雁平 著



胡适
研究丛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

徐雁平 著



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

——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徐雁平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5336-3321-0

I. 胡... II. 徐...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6665 号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2

印 张:12.25

字 数:300 000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 001—3 000

定 价: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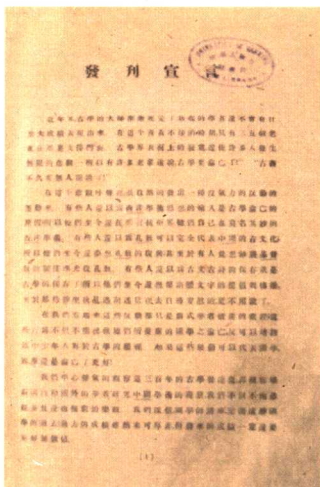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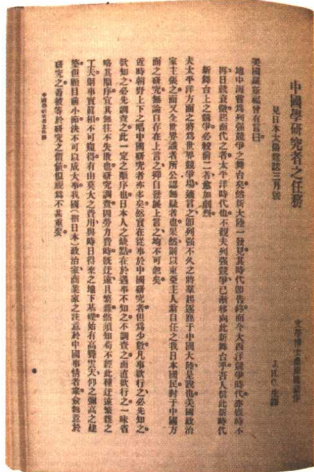
邮 编:230061



胡 适（1891—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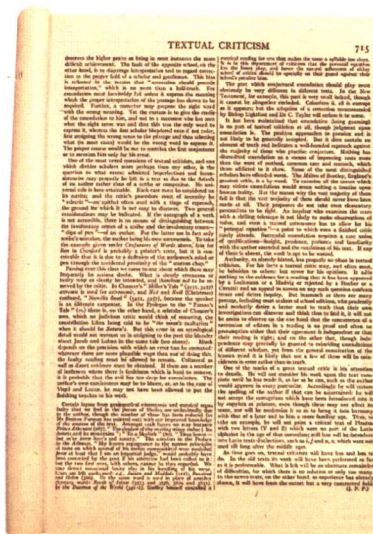


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刊出的“发刊宣言”，其实也是整理国故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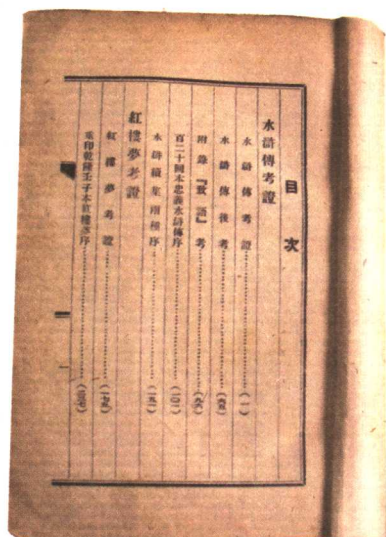
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译载的桑原隲藏这篇文章，对胡适颇有启发。

1911年版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26卷上由John P.Postgate撰写的textual criticism词条，对胡适的校勘学有一定的影响。





民国三年“云南丛书”本
《诗经原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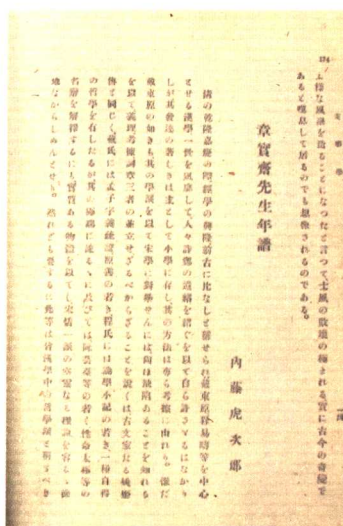
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中国章回
小说考证》目录页。



道光六年陈履和校刊本《崔
东壁先生遗书》。



日本著名的中国学杂志《支那学》创刊号封面。



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
刊于《支那学》第二卷第九号
(1922年5月)。

出版缘起

一位海外学者概括评价胡适的一段话，已渐为学界普遍认同——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一九一七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一九六二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四十年当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胡适终生秉持科学理性态度，强调一切拿证据来，主张重新估定既有价值，以审视的目光打量传统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人物，而不是盲从和迷信。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文化观，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其核心思想乃是以理性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开放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在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和重新省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塑造一种新的文明。胡适不仅是活跃的思想家，更

是踏实的践行者。他富赡睿智的理念、广博深湛的学养、勤勉扎实的作风,加以浓厚的“历史癖”,因之一生佳文良多、著作等身,影响当时既巨惠及后世亦远,并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我们有感于他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究学术的勇气、精神和成就,竭十年之功组织出版《胡适全集》,愿其特出的思想要旨、学术精义、文化底蕴以及人生风范,泽被来者,传诸久远。

与此相应,我们组编“胡适研究丛书”,以期推动胡适研究学术活动的进一步深入。“丛书”框架暂不拘泥而作定格,但凡围绕胡适思想、学术、生平的严谨而富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均所欢迎;不求规模,惟以质是瞻,相宜采择,迤邐出之,自成面目,以收切实裨益学林之效。区区愿忱,敬希察之。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整理国故的兴起及走向	9
第一节 近世学术思想的转型:以目录的分类沿革为例	11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新史的撰写	18
第三节 全面系统地整理国故	42
第二章 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和治学方向的转变	54
第一节 新朴学	54
第二节 三分洋货 七分传统	60
第三节 对清代考据之学的总结	73
第四节 小学上的障碍	80
第五节 转向小说考证	91
第三章 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	110
第一节 作为新学术资源的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	112
第二节 还《诗经》本来面目	128
第三节 《诗经》的世俗化	145

第四章 白话文学史的建立及其影响	160
第一节 文学史的简化以及白话文学史的起点	162
第二节 “佛教的翻译文学”和僧诗	177
第三节 “整理旧文学”的“新路”:论胡适对郑振铎的影响	198
第四节 胡适和陆侃如:从《中国诗史》谈起	215
第五章 整理国故的传行	234
第一节 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	234
第二节 学术研究与出版业的结合	256
第三节 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	285
第四节 开列国学书目的风气及其文化解读	298
附录:国学书目解题(1917—1937)	
第六章 整理国故与近代中日学术交流	321
第一节 近代日本学术的转变与近代中国学的形成	322
第二节 日本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	
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	328
第三节 整理国故的余波以及章学诚和崔述的被发现	339
余 论	358
参考引用文献	362
后 记	384

引 言

对于胡适的研究,我们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①的过程。在十四五年前,南北两位学者几乎是同时意识到要从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去评估胡适在文史之学上的功过是非,北方的就是王瑶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南方的则是周勋初独自完成的“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研究项目。^②这种不约而同的关注以及近年胡适日渐受到重视,也从另一方面证示了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③

本书所作的一些努力,基本上是沿袭王瑶、周勋初等前辈学者的思路,着重探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论题时间的下限大致在1937年。这一年就胡适而言,他的学者身份开始淡化,就中国学术而言,也是一种转变的分界,钱穆“承认三

① 见耿云志《胡适新论》“代序”,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为求行文方便,本书对诸位学界前辈和师长均未用尊称,特此说明。另外,在同一章内,对同一文献的再次引用,注释项目稍加简化。

② 分别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陈平原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书“前言”称,“胡适其人,对近代学风的转变起过很大的影响,但他的资料却难以搜集齐全”,故相关研究,暂阙而不言。

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6。

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①这种“客观的标准”,涉及对学术价值高下评判的问题,亦似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有关;而时间的上限,稍加放宽,比较注意晚清学术与整理国故的关联,对清代朴学也多有涉及,为考察胡适学术思想中的怀疑精神,对宋学亦予注意。时间上限的放宽或者有意地“模糊”,其实只是想突出学术发展的连续性,而不过分强调新旧学术之间的差异或断裂。就文学而言,已有学者注意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②就学术而言,没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以及过去不太受人重视的刘师培等人的开启之功,现代学术之建立则为空中楼阁。他们在学术上承先启后的作用,早已引起学界注意。如浦江清《王静庵先生之文学批评》一文(见《浦江清文史杂文集》)认为胡适的文学研究是推王国维之波澜,吴文祺在《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一文(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中则指出钱玄同在五四时的文学主张多源于章太炎。章太炎说:“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③又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④刘师培亦有类似之论,称六经皆周史所藏旧典,是孔门教科书,孔学在“当时不过列儒家之一耳”,“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⑤这类

①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页15。

②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③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1906年),见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480。

④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1912年),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96。

⑤ 刘师培《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1903年),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1503。

论说影响了五四一代学者对六经及孔子的评价。从整体来看,此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整个的学术体系的转型,而具体到一部经典,如对《诗经》的解读,就出现了一种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

至于整理国故这一学术风气的形成,顾颉刚以为始于章太炎,朱维铮以为发明权应归刘师培,而胡适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刘师培的回应。^① 两家之说,自有其理,于此亦可见章、刘那一代与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的内在联系。而本书之所以强调整理国故是以胡适为中心,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对于国故的态度的不同。这从胡适的一封信中即可看出。胡朴安 1928 年发起成立中国学会,邀请胡适参加,而胡适却婉言拒绝,他说:

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②

胡适强调整理国故须以科学的方法,追求的是科学试验式的客观性,以为如此方能建立科学的国学。主观感情的汰除,完全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形成一种出乎其外的审视。宇文所安认为这是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传统文化已被冻结和僵化。他说:

传统文化从一个活生生的人际之间的交流媒介,一个本

① 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见《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37。

② 胡适致胡朴安函(1928 年 11 月),见《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465。

质上蕴涵着其内在差异的历史过程,变成了一个物化的反思对象。从此“传统”被视为是一个单一化了的整体,与现代的、接受外来影响的“新生”事物构成对比。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各种转变,这个先存的文化却被物体化了,变成一个闭塞僵固的死物,不再具有继续演变的可能性。^①

中国传统学术中最有特色的并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是“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礼记·大学》)之学,但它已成为一个被批判分析的标本;作为文人学者必备的旧体诗文写作也渐被淡化、边缘化,慢慢和古典文学一同形成化石。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知”与“能”的分离过程中,古典文学演进的道路被新文学挤占,最终成为一种被研究的史料。这种研究又往往是客观化的分析,清代考据学因其有科学的精神,便在经史之外的文学研究中再次焕发活力。

近世中国学术的主流基本上是对清代考据之学的继承和发展,故有学者称之为“新朴学”。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和稍后的几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报,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辅仁学志》、《岭南学报》、《金陵学报》所刊论文,考据性质的所占比例最大,而大多数学者皆奉朴学为学术典范。“朴学”一词之所以冠以“新”,是因为研究方法上有突破、研究领域拓宽之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研究清代学术时曾指出,“大量为古代学者编写年表、年谱是十八世纪转向实证考据学风的又一标志”。^②年谱的编撰最注重文献的搜集、考辨、排比,它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可以作为观测学风转变的重要标志,持此以测

① [美]宇文所安《对传统的一种看法》,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74。

②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35。

近世学风,更可为“新朴学”之成立添一例证。以胡适为例,他除了为一批小说家如曹雪芹、高鹗、吴敬梓、李汝珍等编过长短不一的年谱外,还为章学诚、崔东壁作了极见功力的年谱,对于章、崔二人颇有表彰之功。而像胡适这样注重年谱编撰,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如姚名达撰黄宗羲、邵念鲁、朱筠诸家年谱,又补订过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刘盼遂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年谱;谢国桢撰孙夏峰、顾宁人学谱;闵尔昌撰江藩、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大致清代重要学者皆有新编年谱,且时有数人致力于一家年谱之编撰。^①年谱的编撰之风,一方面可说明学者皆注重学术研究的文献工夫,而对清代学者,尤其是朴学家的索隐阐微,则是对其治学方法的认同,若将此种景象与梁启超、胡适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并观,其意图更加明显,那就是要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引入新世纪,并赋予新生命。

考据之学焕发新生命,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②密不可分,这在小说史、戏曲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两块领地的开辟,当然不能脱离近世文学观念转变的大背景,但同时亦应注意敦煌遗书及海外佚籍(尤其是日本所藏中国小说)的发现而带来的推动作用。本书讨论的“白话文学史”的建立,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还有孙楷第的通俗小说书目编撰工作,都牵涉新史料的发现、考证与利用,尤其是章回小说考证,通过胡适与青木正儿引出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以考据之法来研究中国小说、戏曲,在胡适之前,有王国维的开启之功,罗振玉说王国维在“壬子[1912]以前,虽专治宋元戏曲,

① 参见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 此点承罗志田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而所治者，仍为戏曲史料，而非戏曲之本身”^①。此语似针对《宋元戏曲考》而言，而与胡适同时或稍后的学人，如郑振铎、陆侃如、游国恩、孙楷第无不以考据之功见长。余嘉锡在做《四库提要辨证》等研究工作之外，也以余力来做《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类的细密考证，他说：“清代钱辛楣学术极博，于书无所不窥，然甚恶小说，尝作正俗篇，以为小说专导人以恶，有觉世牖民之责者，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见《潜研堂文集》卷十七）余以为不然。”^②从经史的考证而转到小说、戏曲的考证，这恰是对清代学术的继承和变异，“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③变异是传统的新生，只有变异才能突破樊篱。但变异也并不都是好的。清代学者直至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在学术研究上都注重小学工夫，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之四）。而治诸子必先通经；更进一步，翻译西书，提倡白话文学，甚至造新字，也要通小学。章太炎说：“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新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辞的体根，全在文字。”^④遗憾的是，这一套治学方法胡适没有继承下来。而小学功夫的欠缺，形成了胡适治学上的一种障碍，这从他的《诗经》“今笺新注”中就可看出。对于一些与胡适同时代的及其稍后的学者群体而言，也是限制，“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谈何容易！新旧学术的分歧或许正源于此，而新文学兴起之初，颇遭

① 罗振玉《观堂集林序》，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页193。

②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417。

③ 席尔思（Edward Shils）《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7。

④ 章太炎《演说录》（1906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集》二卷上，三联书店1977年版，页453。